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十九世紀後三十年，年輕的明治天皇在日本展開維新運動，使日本成為現代化與工業化之國家，並利用對外戰爭成為新帝國主義之國家，為當時亞洲國家最具有侵略實力者。1895 年清朝與日本在甲午戰爭的勝負，使台灣有五十年的時間為日本之殖民地，成為供給日本原料與物資的對象。此後，日本國內產業發達與資本主義之發展，並繼續向外侵略，1905 年打敗俄國、1910 年占領朝鮮，日本並認為占領中國東北地區，再占領重要的石油產地荷屬東印度群島，以進一步實現日本增強民族力量和取得全球地位的目標。

日本為實現戰略目標，羽翼稍豐便開始了對外擴張。本文所指的「戰爭」，是指日本自 1937 年七七事變以後對中國之戰爭，為二次大戰中亞洲戰場的主要部分，也就是中國所謂的「八年抗戰」。¹日本自 1930 年代軍人得勢後，積極展開向外擴張，有「南進」、「北進」的策略。自從七七事變與中國正式展開戰爭後，日本國內進入國家總動員的戰時體制，也在台灣積極展開皇民化運動。尤其是 1941 年珍珠港事變爆發後，戰爭範圍擴大至太平洋區域，更進一步對南洋地區展開侵略與掠奪資源，日本同時也面對比中國實力更為強大的歐美國家。當時身為殖民地的台灣無論在地理位置、戰爭與經濟補給方面，對日本政府來說都是很好的資源，不僅是「南進」的跳板，²更是戰爭時期「不沉的航空母艦」。

日本人統治了臺灣五十年，透過很強大的政治力量以及計畫性的經濟發展，把臺灣的社會進行極為深刻的改造。把台灣與國家的關係緊密相連，這是清朝治理台灣兩百餘年所未有的經驗。自 1937 年至 1945 年皇民化運動時期，這是台灣人第一次在國家的體制操作之下參與戰爭，直到 1945 年日本投降為止，作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不得不投入日本所謂的「聖戰」。

就戰爭動員來說，島內的台灣人民自戰爭初期，便以「軍夫」、「軍屬」的名義，被徵調到中國或南洋一帶為日本效命；太平洋戰爭後，日本在南洋一帶的佔領，急需維護地方秩序與開發的人員，招考更多種類如巡查、看護婦、通譯等，甚至從 1942 年開始徵召直接上戰場的「志願兵」。戰爭結束前一年，英、美盟軍

¹ 日本則將 1931 年滿州事變（九一八事變）到 1945 年戰爭結束期間，稱為「十五年戰爭」，或稱為「第二次中日戰爭」，模糊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對中國而言，則為艱苦的「八年抗戰」。時台灣身為日本的殖民地，在日本政府的規畫下，成為支援日方作戰的來源之一。

² 南進政策是指日本入侵「南支」與「南洋」，前者為中國華南地區，後者為東南亞地區，包含菲律賓、越南、高棉、泰國、緬甸、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新西蘭與所羅門群島等。

反擊更加劇烈之下，日本政府進一步在台灣實行徵兵制。³這些由總督府招募而參與軍務者，不只有「台籍日本兵」、「臺灣人日本兵」，其所包含的工作範圍相當廣，⁴並非一定是直接與作戰者，許多是在軍中從事農務、勞務、看護、工員、巡察...等。當時全臺灣 600 萬的人口中，要統計整個參與軍務的臺民人數，尤其是戰爭末期參戰的人數，其實是有困難性的，目前一般估計約是 10 餘萬至 20 萬人之間，根據 1973 年日本厚生省的統計，中日戰爭起被徵調的臺民約有 207,183 人，死亡率佔 14.6%，可見臺灣人民為這場戰爭付出的代價。⁵

島內方面，台灣除了 1944 年以後美軍的空襲轟炸，讓台灣人比較有親身經歷戰爭死亡的經驗外，大部分的民眾並未上戰場。不過由於台灣位於「戰區」，當時轟炸的次數與範圍極廣，對環境破壞嚴重，⁶老一輩的人仍記得當時躲空襲、疏散與轟炸的恐怖經驗。⁷為了配合戰時體制，從戰爭初期開始，總督府推行國民精神總動員的工作，塑造臺灣人民意識型態上的認同，並且推行皇民化運動，進一步落實臺灣人民物質動員。⁸於是從戰爭之初，臺灣人民在總督府的政策下，不得不接受增產與物資管制、購買債券、強迫儲蓄、增稅等。同時也組成配合戰時體制的社會團體，如男女青年團、盡忠報國赤誠團、臺灣從軍紀念會、帝國在鄉軍人會...等。生活的各方面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如勞動服務、主動捐獻前線物資、慰問軍人家庭、種植愛國蓖麻、慶祝戰捷遊行、寺廟與正廳改正、改日本姓名...等。因此，除了深刻的空襲經驗外，戰時體制也是當時生活的型態。

本研究所指的「戰爭經驗」，是指 1937 年至 1945 年間，即包括上述島外的軍事動員，及島內配合戰時體制之活動。二次世界大戰已結束六十餘年，目前七、八十歲以上的長者被稱為「走過兩個時代的人」，由於台灣戰後初期特殊的政治環境與實施戒嚴，在政府推行三民主義與中國文化之下，使日治時代的經驗與記憶成為禁忌。八十年代後陸續有耆老的口述資料記錄，⁹使當時的情形能夠與官

³ 李國生，《戰爭與台灣人：殖民政府對台灣的軍事人力動員(1937-1945)》(台北：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⁴ 湯熙勇、陳怡如編著，《臺北市臺籍日兵查訪專輯：日治時期參與軍務之臺民口述歷史》(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1)，頁 19。因軍務內容與類別眾多複雜，「臺籍日本兵」這一詞並不能包含全體參加軍務者，如軍中穿民服的臺民、慰安婦。李國生，《戰爭與台灣人：殖民政府對台灣的軍事人力動員(1937-1945)》(台北：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頁 2、8 註 14。

⁵ 湯熙勇、陳怡如編著，《臺北市臺籍日兵查訪專輯：日治時期參與軍務之臺民口述歷史》，頁 34-35。

⁶ 張建球，〈二次大戰臺灣遭受戰害之研究〉，《臺灣史研究》，4：1 (台北，1999.4)，頁 149-194。

⁷ 吳智偉，《戰爭、回憶與政治：戰後台灣本省籍人士的戰爭書寫》(台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頁 2-5。雖然臺灣人民與戰後來台外省籍民相較，實際戰爭經驗較少，就算是空襲也提供了對戰爭的感受與想像。

⁸ 江智浩，《日治末期(1937-1945)臺灣的戰時動員組織--從國民精神總動員組織到皇民奉公會》(中壢：中央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⁹ 有地方政府或文化局舉辦的座談會與採訪，如宜蘭縣、台北縣、新竹縣、高雄縣與台中縣烏日鄉的口述歷史記錄，以及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主持台籍日本兵座談會，與會後個人式的完整採訪記錄。

方資料互相印證。而目前關於戰時動員與戰時體制之研究，多是屬於由上而下，即研究日本官方政策之制訂與實行，或以口述資料及回憶錄相佐證。另有各縣市文化局所蒐集整理的口述資料記錄，但並無針對鄉鎮區域的地方性研究。

筆者選擇現今彰化縣溪湖鎮，以七、八十歲以上的耆老為受訪對象，採訪其日治末期的生活經驗、動員與戰爭之回憶。以一個範圍不是很大的鄉鎮地方，人口變動與發展並不劇烈，仍保留較多在地的人事物。發掘在地的故事，從「被動員者」之觀點，藉以觀察整個「社會軍事化」時期，地方上的改變與活動情形，以及戰爭的歷史背景對地方與一般個人造成之影響。

溪湖鎮位於彰化縣的中心地帶，以農業為主要產業，從日治時期所設的糖廠即為溪湖鎮的象徵。雖然不如新竹、高雄等地方，在日治時代就有許多工業建設，也並非經濟發展最為重要的都市，而本論文藉由一個區域性的地方的調查，欲了解在大時代的背景之下，二次大戰對於個人與地方之影響。在歷史教學上，嘗試於課本之外，提供學生在地的鄉土故事，在同一個地理空間中，六十年前的先輩因為戰爭所帶來生活與生命的改變。鄉土是最易觀察的小社會，具體的素材可以呈現當時的生活記錄啟蒙學生，提昇他們對生活周遭人文自然環境的關心與興趣。使學生對於鄉土地方，能產生土地認同，更進一步感同身受，增長歷史素養。

第二節 文獻探討

一、前人的相關研究

(一)戰爭動員方面

關於臺灣參與二次大戰的相關研究，有數篇碩士論文主要是針對日本在戰爭時軍事動員的部分。鄭麗玲的碩士論文《戰時體制下台灣社會(1937-1945)－治安、社會教化、軍事動員》，以三方面探討戰時體制。從戰爭時期保甲制度壯丁團之演變，分析戰時體制下社會教化組織的變革與活動，最後則說明軍夫、志願兵與徵兵之概況。¹⁰之後並將其訪談之軍夫、軍屬與志願兵等記錄，集結成《臺灣人日本兵的戰爭經驗》，由台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¹¹另文〈海南島的臺灣兵

¹⁰ 鄭麗玲，《戰時體制下臺灣社會(1937-1945)－治安、社會教化、軍事動員》(新竹：清華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¹¹ 鄭麗玲，《臺灣人日本兵的戰爭經驗》(台北：台北縣立文化中心，1995)。

(1937-1945)》，則聚集焦點於海南島地區臺灣兵之活動，藉以看出不同戰地的活動之特殊性。¹²

江智浩的碩士論文《日治末期(1937-1945)臺灣的戰時動員組織--從國民精神總動員組織到皇民奉公會》，分析軍事動員之組織，比較國民精神總動員組織與皇民奉公會的組織、運作與活動，並說明台籍菁英在動員組織內扮演的角色。認為「就戰時動員組織的發展脈絡而言，國民精神總動員組織可說是日本殖民當局企圖集結非官方勢力以為戰爭的開始，而在皇民奉公會成立以後整個戰時動員組織發展宣告成熟。」¹³

李國生的碩士論文《戰爭與台灣人：殖民政府對台灣的軍事人力動員(1937-1945)》，則單獨針對軍事人力動員一項，探討日本政府實際動員臺灣人民之過程。文中首先說明戰局變化與臺灣對日本之角色，促使國家總動員法之實施。對動員的項目與類別做精細的分析，如軍夫、軍農夫與軍屬之內容，包括白樺隊、臺灣農業義勇團、高砂義勇隊、臺灣特設勞務奉公團、海軍通辯、陸軍通譯、警察隊及巡查補、看護婦與看護助手。並從兵制改變說明台籍日本兵的性質，以台灣少年飛行兵為例說明從軍過程，最後還有慰安婦之動員過程。¹⁴

台籍女性投入戰爭工作方面，有楊雅惠的碩士論文《日據末期戰時體制下的台灣婦女(1937-1945)—以殖民政府的教化與動員為分析中心》，探討殖民政府教化女性、動員女性的政策。其研究成果認為傳統性別分工中女性與家庭的緊密關係，在殖民政府因戰局的政策中再度被強化。其次在軍事動員下，當所有的事物冠上「皇」字時，就已經賦予這些事物的正當性。女性沒有身體的自主權，她們的身體擁有者是皇國，不同角色的女性所遭遇國家權力強制「性支配」的情境並沒有不同。最後並指出日本政府針對女性實施的勞務動員，事實上並沒有將女性帶入一個比較多元性的職業領域。¹⁵

除了上述幾篇歷史學研究所的碩士論文以外，台大政治研究所的林繼文以政治經濟學之角度分析動員之背景因素。其論文《日本據台末期(1930-1945)戰爭動員體係之研究》，分析此時期日本在台的戰爭動員政策，動員範圍不只涵蓋軍事物資方便徵用而已，還有整個社會經濟結構之重編。並指出此動員性質並非專門針對戰爭，而是自殖民統治以來即具有的「連續性」，包括總督專制、警察體制、

¹² 鄭麗玲，〈海南島的臺灣兵(1937-1945)〉，《臺灣風物》，46：3（台北，1996），頁74-104。

¹³ 江智浩，《日治末期(1937-1945)臺灣的戰時動員組織--從國民精神總動員組織到皇民奉公會》（中壢：中央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¹⁴ 李國生，《戰爭與台灣人：殖民政府對台灣的軍事人力動員(1937-1945)》（台北：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¹⁵ 楊雅惠，《戰時體制下的臺灣婦女(1937-1945)—日本殖民政府的教化與動員》（新竹：清華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殖民地經濟之壟斷。¹⁶

專書方面，有周婉窈的《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書中有兩篇述及台籍日本兵的專文。其中一篇是〈日本在台軍事動員與台灣人的海外參戰經驗〉，背景為 1974 年台籍日本兵李光輝在菲律賓被發現後，引發媒體與社會對台籍日本兵的關注，而延伸出對日本求償的問題。十年前學界開始為台籍日本兵做口述歷史，紀錄與研究。本篇文章發表於 1995 年，說明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從志願兵制度到全面徵兵制，台灣人參加戰爭的層面愈來愈大，從「血書志願」的熱潮可見日本在台愛國教育的結果。再舉例說明台灣人海外作戰的經緯，而最後以「尷尬的過去、難言的苦楚」，道出身為歷史研究者對於台籍日本兵應「同情的理解」，並提醒不同記憶與國家分裂的可能。另一篇〈美與死〉為探討戰爭時期，在報章雜誌上可以看到對於戰爭「浪漫想像」的辭彙，如英勇的男性為櫻花，具有日本的女性為「大和撫子」（花名），用美麗的詞彙包裝戰爭的殘酷。同時比較此種辭彙在朝鮮與日本出現的情形，指出此用法除了是戰爭宣傳外，並與學校教育、美學傳統交融，了解這些特殊背景所造成的詞彙，才能對當時的行動有真切的認知。¹⁷

湯熙勇、陳怡如編著在《臺北市臺籍日兵查訪專輯：日治時期參與軍務之臺民口述歷史》內有一篇專文，篇名為〈臺民參與軍務之經過及其影響—從日治到戰後初期〉，將日治時期台民參與軍務以 1937 年畫分為前後兩期，前期台民參與軍務以本島鎮壓抗日份子為主，後期則是因應對外戰爭，其性質與種類都較前期複雜。並說明戰爭結束後台籍日本兵之身分轉變成旅外台民，政府處理戰後台灣人民生活與管理之問題，由於台民身處不同地域或國家，其所面臨的問題有所差異，因而分別論述在中國大陸地區、日本與南洋地區，所面臨諸如戰犯、返台之問題。¹⁸

(二)口述歷史方面

從上段的回顧可看出這些研究多是由上而下，從官方的角度說明如何動員民間人力物力，促使臺灣人民投入與配合戰時體制。另有一些關心「台籍日本兵」後續發展與生活者，則利用採訪口述資料與座談會的方式，由「被動員的個人」親自說明身處於戰爭時代的經驗，並且整理記錄出版。

1995 年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舉辦「台籍日本兵歷史經驗座談會」後，周婉窈將三場座談會的發言記錄整理成《台籍日本兵座談會記錄并相關資

¹⁶ 林繼文，《日本據台末期(1930-1945)戰爭動員體係之研究》（台北縣：稻鄉，1996）。

¹⁷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台北市：允晨文化：2002）。

¹⁸ 湯熙勇、陳怡如編著，《臺北市臺籍日兵查訪專輯：日治時期參與軍務之臺民口述歷史》（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1），頁 1-66。

料》，座談會的主題包括海外戰地經驗、戰後心路歷程與戰債求償問題。由於座談會內容瑣碎而片段，後續乃有蔡慧玉編著、吳玲青整理的《走過兩個時代的人：台籍日本兵》的補充。

蔡慧玉接著將訪談範圍擴大，使名單取樣能夠兼顧多樣性。在訪談內容方面更加深入，則由生命史的角度，從受訪者的幼年經驗、學校生活、參戰經驗、戰後生活、二二八事件到對日索賠，能夠對個人有完整的認識。文末也提供口述歷史的過程所遭遇的問題，並提醒注意受訪者所說的訊息之真切性，以及事後的記錄應再查證，如名詞的確認與史實的校正。¹⁹

各縣市亦有二次大戰相關的口述歷史資料，例如鄭麗玲與台北縣立文化中心合作，採訪撰述而成《臺灣人日本兵的戰爭經驗》，採訪二十位參與海外戰爭的日本兵，並於每篇刊頭寫下各地戰場的存歿人數資料。²⁰宜蘭縣立文化中心也以座談會的形式，集結成《宜蘭耆老談日治下的軍事與教育》，以問答的方式呈現記錄。²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則有《天皇陛下の赤子—新竹人・日本兵・戰爭經驗》，為潘國正對新竹市的台籍日本兵訪談後，分派遣地區寫出戰爭經驗。²²此外，湯熙勇、陳怡如所編著的《臺北市臺籍日兵查訪專輯：日治時期參與軍務之臺民口述歷史》，針對現居住在大台北地區，曾經參與軍務的老人，訪問其生命歷程。受訪者所擔任的工作類別包含軍屬、通譯、俘虜監視員、海軍高座少年工、高砂義勇隊、陸軍監視所情報員、農業指導員等類型。文中並提供受訪者基本資料與綱要，與訪談經驗分享，非常值得參考。²³台中縣烏日文史協會於 2003 年蒐集十餘位當地參與二戰的看護婦、少年工等，並與舊照片、圖片結合，收錄於《烏日文史匯編（第二集）》。²⁴

時間與現在較為接近的，則是展覽的推廣，透過立體與實質物品的陳設，使一般大眾增加瞭解二次大戰時臺灣的情景。尤其是 2004 年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舉辦「烽火歲月—戰時體制下的臺灣史料特展」，並舉辦研討會與耆老座談會，出版《烽火歲月—戰時體制下的臺灣史料特展圖錄》上下兩冊，將戰時體制含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軍事等五大類，再細分成導讀與二十三項主題，包含皇民奉公會、警政措施、戰時債券、生產活動與配給、社會團體、愛國婦人會、戰時圖書、文書宣傳、神風特攻隊、軍人生活用品、空襲歲月...等。包含清楚而關鍵的文字說明，與實體展覽物的圖片相輔相成，可提供讀者對於戰時的生活有想像的

¹⁹ 蔡慧玉、吳玲青，《走過兩個時代的人：台籍日本兵》（中央研究院台史所，1997），頁 1-24。

²⁰ 鄭麗玲，《臺灣人日本兵的戰爭經驗》（臺北縣：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5）。

²¹ 宜蘭縣立文化中心，《宜蘭耆老談日治下的軍事與教育》（宜蘭：宜蘭縣立文化中心，1996）。

²² 潘國正，《天皇陛下の赤子—新竹人・日本兵・戰爭經驗》（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7）。

²³ 湯熙勇、陳怡如編著，《臺北市臺籍日兵查訪專輯：日治時期參與軍務之臺民口述歷史》（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1）。

²⁴ 台中縣烏日文史協會，《烏日文史匯編（第二集）》（台中縣：台中縣烏日文史協會，2003）。

畫面。²⁵會後有李展平的追蹤報導出版，書名為《前進婆羅洲：臺籍戰俘監視員》，針對幾位 BC 級戰犯訪問記錄；²⁶以及另外一本結合眾人之作而成《烽火歲月：臺灣人的戰時經驗》，皆為兼具文學性質的報導記錄。²⁷

二、基本史料說明

(一)民間記錄與個人傳記方面

除了學術性的研究外，目前出版一些相關記錄，如自傳、傳記與專訪記錄。如吳淑真、吳淑敏偶然參加爺爺的同學會後，進一步將訪談寫成《拓南少年史：探尋拓南工業戰士們的身影》。拓南工業戰士是為了進行石油開發等資源拓植工作，於戰爭後期招募約 700 名台籍青年，於台北州馬場町受訓後，到南洋一帶工作，本來是工廠職員的拓南少年，在戰爭之末也被迫在當地成為軍人、軍夫。其中一位人物專訪，為作者的爺爺－吳文旦先生，來自溪湖鎮，為拓南第一期機械科的學生。²⁸

戰爭後期約有 8000 名到日本海軍高座 C 廠工作的少年工，至今定期舉辦同學會紀念，並將他們的故事與經歷出版，如陳碧奎的《赤手空拳：一個「少年工」的故事》，²⁹王清溪著、郭嘉雄整理的短文〈記日據末期赴日本為海軍工員之臺灣少年心酸史〉；³⁰以及蒐集相片、書信與證件等集結成《高座海軍工廠台灣少年工寫真帖》。³¹2006 年郭亮吟導演完成少年工的紀錄片《綠的海平線》，對立場、身份不同的當事人訪談，包括台灣少年工、勸誘他們的日本老師、訓練他們的日本軍官，穿插報、私人信件、證書等精彩的平面文獻與影像史料的交錯呈現。本片是文字以外更能使大眾親近台灣歷史之作品，帶動許多民眾對過往台灣記憶的注意。

個人傳記方面，許多歷經日治時期的長者，回顧個人一身的遭遇同時，不免述及自己的幼年、少年和青壯年時期所經歷的日治時期與戰爭經驗，³²包含日治

²⁵ 林金田總編輯，《烽火歲月：戰時體制下的臺灣史料特展圖錄》（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3）。

²⁶ 李展平，《前進婆羅洲：臺籍戰俘監視員》（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5）。

²⁷ 李展平等著，《烽火歲月：臺灣人的戰時經驗》（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5）。

²⁸ 吳淑真、吳淑敏，《拓南少年史：探尋拓南工業戰士們的身影》（台北：向日葵，2004），頁 38-59。

²⁹ 陳碧奎口述、林慧姪整理，《赤手空拳：一個「少年工」的故事》（台北：前衛，1998）。

³⁰ 王清溪著、郭嘉雄整理，〈記日據末期赴日本為海軍工員之臺灣少年心酸史〉《臺灣文獻》，48：4（南投：1997）頁 115-145。

³¹ 陳碧奎、張瑞雄、張良澤，《高座海軍工廠台灣少年工寫真帖》，（台北：前衛，1997）。

³² 如何旗化所著《台灣監獄島》（高雄：第一，2002）、吳修齊《七十回憶》（著者自印，1983）、簡茂松《我啊！一個台灣人日本兵簡茂松的人生》（台北：圓神，2001）、許曹德《許曹德回憶錄》（台北：前衛，1990）、黃華昌，《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台北：前衛，2004）等等。

時期的教育制度、空襲與物資管制、志願兵與徵兵等，皆可增進對整個大時代環境的瞭解。至於針對臺灣人參與戰爭這方面，比較突出的有臺籍日本兵許昭榮，他親自寫下《動盪時代的無奈：臺籍老兵血淚故事》，³³從其中激動的文筆，³⁴可以看到戰後台籍日本兵受日本政府與國民政府之忽視，民眾對於歷史的無知，其不平的心情，這樣的文字書寫相對於學術研究論文，更使人能對其境遇感同身受。

以上部分資料並非專門針對溪湖人的記載，但可藉以了解戰時體制與動員情形。屬於戰爭小說的文類，由於小說具有虛構性質，且有前人已經有所研究，³⁵因而不納入本討論之範圍。

(二)鄉土史料方面

近年來彰化縣文化局推動社區營造、村史撰寫工作的同時，也挖掘一些在地的戰爭記憶故事。如彰化地區鐵路沿線遭受轟炸的情形，二水機關庫外的給水塔，是儲存蒸汽火車專用的水源，在二次大戰曾被美軍轟炸，未傷及結構，但有機關槍掃射的痕跡。³⁶

戰時因為徵收米、布民間物資缺乏，一般民眾吃蕃薯籤、用旺萊（鳳梨）葉織布。學生受戰爭影響，在學校的活動也有變化，包括配合戰爭勝利的遊行、捐獻與各種愛國「奉仕」。例如彰化高等女學校的學生在禮堂舉行「遺家族慰安會」，慰問從軍者的家人，表演內容有表揚愛國精神的「軍國之母」，以及日本傳統慶豐年的「瑞穗舞」。³⁷

最深刻的仍是躲空襲的經驗，如學生上課時的記憶：

要帶一個內塞棉花的頭套，以便空襲時可戴在頭上，當時，上學後，有

³³ 許昭榮，《動盪時代的無奈：臺籍老兵血淚故事》，（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5）。

³⁴ 許老先生於1994年創辦「全國原國軍台籍老兵暨遺族協會」。許老先生曾於日本皇太子結婚時投稿文章獲選佳作，但因為內容問題主辦單位並未刊載，因內容述及被殖民者的心路歷程，如「日治時期和日本一起泣笑，一同苦樂，同為天皇而盡心盡力的『皇民』，現在變成不相干的人…直到今日，世界上對日本最有親切感的民族是臺灣人，這一點不僅是日本皇室，連日本政府都忘得一乾二淨。」許老先生所關心的台籍老兵，不僅是日治時期以日本人身分從事軍務者，亦包括戰後國民黨與共產黨內戰期間，受國民政府徵召至大陸從軍者。許先生將這些一生中曾被迫作為不同政體之戰士的台灣人，稱之「無國籍戰士」與「無名戰士」，並致力調查其現況，且推動在高雄興建「國共內戰殞身台灣無名戰士慰靈碑」。在他長期努力奔走之下，仍感受不到台灣政府對歷史尊重與重視，因而於2008年5月20日自焚明志，希望台灣人在戰爭中的歷史不要被遺忘，並從尊重歷史中獲得台灣人之尊嚴。

³⁵ 莊嘉玲，《臺灣小說殖民地戰爭經驗之研究》（台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論文，2001）；吳智偉，《戰爭、回憶與政治—戰後台灣本省籍人士的戰爭書寫》（台北：臺灣師大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³⁶ 賴宗寶，《二水采風：南彰化二水鄉自然、人文、風土、民情調查研究》（彰化市：彰化縣文化局，2002），頁147。

³⁷ 陳一仁，《彰化縣老照片特輯四—百年樹人》（彰化市：彰化縣文化局，2003），頁115-128。

一部份時間用在練習躲空襲。每天早上還得由住家附近的學長，將鄰近的學生集合起來，帶到神社（今彰化市文學步道上涼亭那裡）參拜、早操、撿拾枯枝枯葉，帶回來擺在馬路中間，點火悶燒，造成漫天煙霧，防止盟軍飛機尋獲目標。³⁸

由於這些口述資料零星散見於各鄉鎮文史記錄，但是溪湖鎮的相關資料卻非常少。目前關於溪湖鎮的論文有楊幸雪的《漢人血緣聚落的分化與整合：以彰化縣溪湖鎮湖仔內地區為例》、³⁹莊淑菁的《清代溪湖鎮的開發與社會變遷》，⁴⁰主要聚焦於清領時期溪湖鎮的開發情形。1998年由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主編，各縣市耆老口述歷史系列中《彰化縣鄉土史料》，訪問在地人楊太平、楊永川、陳仁賢與洪渺四位在地的重視鄉土文化的前輩，其中一小段談及台籍日本兵的情形，保留部分珍貴史料，但內容仍不足。⁴¹2002年由財團法人施金山文教基金會訪談、撰稿，出版《彰化縣口述歷史第六集：溪湖鎮蔗糖產業》上、中、下三冊，分別訪談各村里耆老，並以實際問答之內容記錄。其內容主要是溪湖鎮各村里的產業、信仰、開發與發展等，以一問一答的方式呈現，結構鬆散。內容沒有關於二次大戰期間生活的主題性採訪，只有零星談到空襲經驗，如「美軍看到人就掃射，在糖廠南邊的合成工廠，每次來都炸糖廠、火車，差不多民國30年時，一台飛機追火車，掃射到巫厝庄一條路，有人腳被炸斷。」⁴²因而有必要進一步採訪與查證，也提供筆者採訪之方向與內容。

(三)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的官方史料

這一部分若能找到關鍵資料實非容易，因戰時許多資料散佚，或僅記載大的行政區域資料，地方資料較難尋得。例如1934年出版的《臺灣軍特種演習參加誌》，只有新竹、台北兩州各行政單位、地方官公署配合防空演習的準備與練習記錄；⁴³1944年出版的《本島空襲狀況》，僅記載當年10月12至17日，短短三日內因空襲而傷亡的人數、毀壞的屋舍與行政單位等資料。

因此僅能由部分記錄中尋找可用資料，如《第一回（前期）修了者名簿》，內有5位溪湖人完成陸軍兵志願訓練之名單。⁴⁴

³⁸ 楊恰人口述，參見賴和紀念館網頁 http://cls.admin.yzu.edu.tw/LAIHE/A/a_2b.htm#title。

³⁹ 楊幸雪，《漢人血緣聚落的分化與整合：以彰化縣溪湖鎮湖仔內地區為例》（台北：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⁴⁰ 莊淑菁，《清代溪湖鎮的開發與社會變遷》（台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⁴¹ 《彰化縣鄉土史料》（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頁254-277。

⁴² 施金山文教基金會，《彰化縣口述歷史溪湖鎮蔗糖產業第六集(中)》（彰化市：彰化縣文化局，2002），頁374。

⁴³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臺灣軍特種演習參加誌》，1934年。

⁴⁴ 臺灣總督府陸軍兵志願訓練所，《第一回(前期)修了者名簿》，1943年。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其限制

本文之研究方法主要是歷史研究法與口述訪談並用，前者包括日治時期溪湖鎮的官方記錄與統計資料，以及前人對於戰時期的皇民化運動、戰時體制與動員的研究，針對地方性者加以整理，並與口述資料比對。

除了文獻研究法以外，由於以「被動員者」之角度來觀察，因此需要大量口述歷史資料，而受訪者並不侷限軍人、軍屬等島外軍事參與者，當時在島內的一般民眾之經驗也很重要。

張玉法先生曾說明口述歷史作為當代歷史研究方法之一，有幾個作用：⁴⁵

- 1.在文字、器物、圖像等證物不足時，以口述歷史作為一種人證。
- 2.在文字、器物、圖像等物證史料缺乏時，以口述歷史作為主要史料，使許多歷史課題的研究成為可能。
- 3.讓當事人參與歷史重建工作，使史學不只是史學家的事，而是人人可以參與的事。
- 4.讓當事人述說親身經歷的事，增加歷史臨場感、親切性。

本研究主題為「戰爭經驗」，為某一段時間某一地區人共同體驗的特殊事件，其中或有個別性與普遍性，由於不是針對社會精英的特殊經驗，期望更能貼近一般民眾之生活與心理，提供歷史研究的多元面向，以在地人生活的空間與人生故事，重建二戰時期溪湖人面臨戰爭的生活經驗。例如戴寶村教授利用地方所出版的口述資料，與二次大戰時盟軍空襲台灣的資料比對，寫成〈B29 與媽祖：臺灣人的戰爭記憶〉，統計台灣各地在轟炸與空襲過後，有關媽祖接砲彈的各種傳說出現，反映出官方資料不可能出現的題材，卻表現出民間普遍性的心理狀態與需求。⁴⁶此即許雪姬教授也提到口述歷史之內容能「為研究工作提供了民間觀點及豐富的資料」。⁴⁷

中研院台史所研究員蔡慧玉與基層受訪者的經驗中，也談到與非菁英式專訪的可能遇到的狀況，並提醒口述資料中的名詞、數據與年代應該經過詳加考證、比對，李國生在引用口述之料前也提醒了這一點，⁴⁸如此才能增進口述歷史的史

⁴⁵ 游鑑明，〈傾聽她們的聲音：女性口述歷史的方法與口述史料的運用〉（台北縣：左岸，2002），頁5。張玉法序。

⁴⁶ 戴寶村，〈B29 與媽祖：臺灣人的戰爭記憶〉，《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2期，（台北：2004），頁223-275。

⁴⁷ 許雪姬，〈近年來臺灣口述史的評估與反省〉，《近代中國》，149期，（台北：2002.6）頁41-42。

⁴⁸ 李國生，〈戰爭與台灣人：殖民政府對台灣的軍事人力動員(1937-1945)〉（台北：臺灣大學歷

料性。

此研究方法本身也有所限制，主要是二次大戰結束至今已六十多年，能探訪到的耆老年紀約七、八十歲，需體力好、記憶力佳者，又本身對於日本政府統治有所觀察。這些耆老在皇民化運動時期多是小學生，能夠找到當時才 20 歲左右的青年並不容易，這也是本論文困難但必須完成的部份。耆老的病痛、遺忘與不願意接受採訪，也是本研究必然會遭遇到的情形。再者，歷經六十餘年之歲月，在工商社會的變化下，有些前輩已遷移他處，仍在地方上居住並為人所知，亦是研究者本人所需努力尋訪的對象。

第四節 預期成果

地理位置在彰化縣的中心地帶的溪湖鎮，以農業為主要產業，清朝開發台灣時並不如彰化市、鹿港、二林、北斗等重要。自從日治時期開始展開現代化建設，所設的糖廠即為溪湖鎮的象徵。雖非其他鄉鎮地方在日治時代就有許多工業建設，也並非經濟發展最為重要的城鎮，戰爭結束後其人口流動較無大城市變動劇烈。而本文藉由一個地方性的調查，了解在大時代的背景之下，二次大戰對於個人與地方之影響。歷史教學方面，嘗試能於課本之外，提供學生在地的鄉土故事，在同一個地理空間中，六十年前的先輩曾經經歷的戰時體制歲月，並因為戰爭所帶來生活與生命的改變。

本研究之預期成果如圖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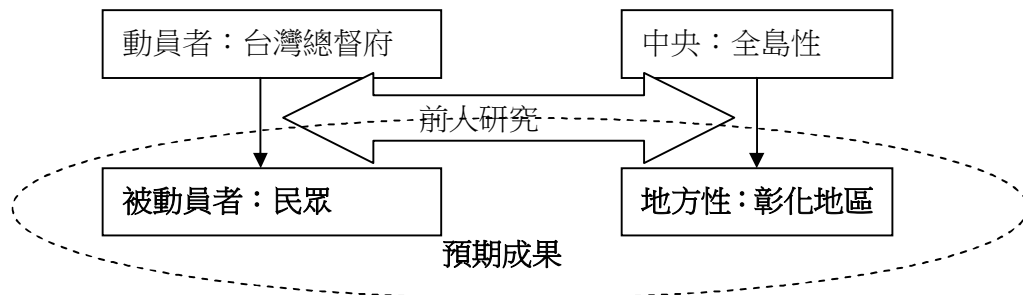


圖 1 研究預期成果圖

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頁 9。作者舉例說明回憶的資料仍需要與史料比對，不能不加考證就完全引用，否則不只使用到錯誤訊息，可能以訛傳訛。例如看護婦可能被騙而成為慰安婦，並非正確的，卻引起媒體與社會的誤用，造成當事人之困擾。

首先，本研究第二章主要探討戰爭爆發前，1930 年代溪湖人的生活情形，由一個完全農業的鄉鎮，由於糖廠的建立，帶動地方上市街的變化與經濟發展。其中保持台灣鄉村的樸實，也有新事物的建立。又臺灣總督府之殖民統治，透過街庄、警察與保甲之行政控制，塑造出在地人對行政區域與家鄉之認同。

第三章說明自從 1937 年戰爭爆發後，總督府將全台進入戰時體制狀態，在戰時體制之下，溪湖鎮人生活情形的改變。包括米穀管制與配給、國民精神總動員與皇民化運動、轟炸空襲與疏散與島內的軍事參與。

第四章分析溪湖鎮人在戰爭的背景之下，有人收到「紅單」而被徵召到南洋當軍夫；有人為了避免徵召或是尋求更高的薪資，而選擇報考警察、巡查補、海軍工員與少年工。因此離鄉背景，分別到海南島、中支、新幾內亞、菲律賓等前線戰地，而有更深刻的體驗。

第五章為結論，預期能藉由此研究，為地方保留珍貴史料，以及呈現大環境底下一般民眾的心理與生活，提供歷史教學中對「人」的關注，此及達成為本研究之目的。